【文学研究】

《奥兰多》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

綦亮

(苏州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国内学界对《奥兰多》中的东方再现缺少关注。伍尔夫在有关东方旅行的游记及与同性恋恋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的通信中,表现出明显的东方主义心态。她把这种心态带入对《奥兰多》东方场景的虚构,通过表现奥兰多对土耳其景物和土耳其吉卜赛人的偏见及由此生发的归家欲望,反衬奥兰多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种族和民族身份,将土耳其降格为文化他者。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与土耳其的政治角力,揭示出《奥兰多》作为一部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现实指涉和地缘政治内涵,也体现了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与帝国政治的紧密关联。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土耳其;东方主义;英国性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章编号:**1673-5420(2018)04-0095-08

引言

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约瑟夫·康德拉(Joseph Conrad)的《诺斯特罗莫》(*Nostramo*)描写南美;《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讲述非洲;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常年漂泊海外,他的《迷途女孩》(*The Lost Girl*)、《袋鼠》(*Kangaroo*)和《羽蛇》(*The Plumed Serpent*)分别塑造了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的经典文学形象。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作品同样如此,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航》(*The Voyage Out*)就把背景设在南美,另外一部作品《奥兰多》(*Orlando*)则将视角延伸至土耳其。国内学界对《奥兰多》的研究多集中在双性同体、传记写作、历史书写和后现代叙事等方面,对这部作品中的东方再现缺少关注。^①本文结合伍尔夫的东方旅行经历及其与同性恋恋人维塔·萨克维尔-韦

收稿日期:2018-05-15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綦亮,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和西方文论。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伍尔夫小说民族叙事研究”(14WWC002);2017年度江苏省“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经费资助

① 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见:蔡芳、谢葆辉的《从〈奥兰多〉感悟伍尔夫小说创作的文脉:双性同体观》,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年第12期;吕洪灵、蔡晨的《花岗岩与彩虹的姻缘——伍尔夫的“新传记”〈奥兰多:一部传记〉》,载《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吴庆宏的《〈奥兰多〉中的文学与历史叙事》,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秦海花的《传记、小说与历史的奏鸣曲——论〈奥兰多〉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载《国外文学》2010年第3期。

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相关通信,从后殖民理论视角对《奥兰多》进行语境还原,认为该作对土耳其的文学书写是伍尔夫作为西方白人作家对东方的殖民凝视,映射出20世纪20年代英国与土耳其的政治角力,体现了伍尔夫的文学创作与帝国政治的勾连,具有明显的现实指涉和丰富的地缘政治内涵。

一、东方之旅与伍尔夫的东方主义心态

和《远航》一样,《奥兰多》也是一部关于旅行的作品。如果说《远航》还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文学痕迹的话,那么《奥兰多》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主义“奇书”,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对性别、生命和历史进行了颠覆式再现,具有突出的奇幻文学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兰多》是完全脱离现实的文学狂想,与《远航》对南美的纯虚构不同,《奥兰多》对东方国家土耳其的书写有更多的现实依据。1906年,伍尔夫曾与友人造访伊斯坦布尔,虽然只是短暂停留,却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直观素材。

通览伍尔夫的这篇旅行笔记就会看出,伍尔夫并不只是在简单地记录自己的旅行经历,同时也在表达自己对东西方文化和文明关系的关注和思考。往深层挖掘,许多看似随意和散漫的文字其实是观点和立场的表述,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首先,伍尔夫捕捉到并认可了土耳其这个东方古国的美。当航船慢慢靠近土耳其时,晨曦中若隐若现的异域景象给伍尔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六点钟的时候我站在甲板上,突然发现整个君士坦丁堡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圣索菲亚大教堂就像一个被冻僵的三重球状水泡向我们漂来。整个建筑用料上乘,像玻璃一样纤薄,轮廓分明,线条丰满,同时又如金字塔一般坚固。这或许就是它的美。”^{[1]347}而且,伍尔夫能凭借其非凡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将异域表面的美感上升到文化特殊性的高度加以认识,她认为土耳其的生活“并不跟随欧洲模式,甚至不是对巴黎、柏林或伦敦的次等模仿……当一束束光线照亮大地,水面上灯火通明时,你就明白你是在观看一出精彩的大戏,是一场独立于某些西方伟大国家的演出”^{[1]348}。

“东方旅行提供给伍尔夫一个机会,让她去接触具有完全不同习俗、语言和宗教的人,并且通过游览奥斯曼帝国,体验一个全新的文明秩序。君士坦丁堡毕竟是东西方交汇的传奇之地。”^[2]尽管伍尔夫在与东方的接触中表现出一定的文化相对主义思想,但她的旅行笔记所传递出更多的是东西文化遭遇时,西方人潜意识中流露出的傲慢、偏见和优越感。通观全篇,伍尔夫始终以一种俯视的姿态观看异域,对异域的环境、习俗和宗教都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屑和鄙夷。当真正近距离接触异域风情时,之前由外在感官刺激引发的瞬时认同即刻被一种更加深层的贬低和排斥异己的心理所取代:“然而,除了一些奇怪的景象给我们的感官冲击以外,这次伊斯坦布尔之旅确实没给我们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从这些景物中完全看不出任何细节之美,街道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说他们的民族服饰——土耳其毡帽和双排扣长礼服——算是一种补偿的话,那么也是让人失望的补偿。”^{[1]349}对于土耳其妇女戴面纱的习俗,伍尔夫也不以为然,认为它并没有流传中的那么神圣,只不过是“一种非常脆弱的象征”^{[1]352}。而在评价土耳其的宗教信仰时,伍尔夫则完全表现出一个旁观者的漠然:“没有哪个基督徒,包括欧洲人能指望理解土耳其人的观

点;你是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就如同你是白人还是黑人一样,都是生来注定的。”^{[1]355-356}在观看土耳其人的宗教仪式时,她感觉那些人仿佛是“笼中困兽”,一些“被无形的权力操控的木偶”^{[1]34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伍尔夫作为一名英国人的自豪和骄傲。在描写土耳其的伦敦人时,伍尔夫不吝溢美之词:“他们的脸没有什么表情,这才是文明人的真正标志。他们总是在想问题,所以你不用说话就能打发时间。而且他们对陌生人也很礼貌,谈话时各种语言都先讲一点,好让你选择自己的母语。”^{[1]352}而在讲述自己的一次购物经历时,伍尔夫更加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这些丝织品贵得离谱,太糟糕了;在英国只要一半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但你相信吗?我们居然还想买,而且毫不犹豫地准备花四个毕阿土特买一匹——英国是一个伟大和慷慨的民族。”^{[1]354}

反观土耳其,从总体上看,这个东方文明古国被伍尔夫描述为一个落后、无序,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和潜在危险,离文明尚有一段距离的蛮夷之邦。伍尔夫庆幸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不需要在土耳其久居,认为“如果你命中注定要在这里过一辈子的话,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就像住在火山下面一样”^{[1]357}。应该说,伍尔夫所呈现的东方并非真实的东方,而是经过西方文化偏见过滤后被扭曲的东方,或者用萨义德的话说,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3]136}。这种再现方式所依赖的是一种“位置的优越”(positional superiority),它“将西方人置于与东方所可能发生的整体系列之中,使其永远不会失去相对优势的地位”^{[3]10}。

影响《奥兰多》构思和创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伍尔夫与同性恋恋人维塔的交往。众所周知,维塔是小说主人公奥兰多的原型,维塔的儿子奈杰尔·尼克尔森(Nigel Nicolson)更是将《奥兰多》称为“文学中最长、最迷人的情书”^{[4]183}。维塔于1926年和1927年两次出游东方,足迹遍及印度、伊朗、伊拉克、波斯和印度等国家,创作了《德黑兰旅客》(*Passenger to Teheran*)和《十二日》(*Twelve Days*)等游记作品。这些作品虽然表达了对欧洲文明的反思,但从根本上讲依然受制于西方旅行叙事对非西方国家殖民主义再现的传统。比如,维塔在《德黑兰旅客》中一方面承认“亚洲不是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亮点”^{[5]176},在描写异域景物时又流露出明显的文化优越感,以及承载强势文明的西方旅行者对非西方边缘地带的掌控欲。环顾房间里散落四处的波斯陶器,维塔写道:“这些碗和碎片发出幽幽的绿光和剔透的蓝光,上面的图案、数字、骆驼、柏树枝和手迹若隐若现,让人捉摸不透。天知道我怎么能把它们都带回家。此时此刻,它们立在我屋子的四周,让人想起了那些被遗忘的岁月中的沧桑和浪漫生活,就像注视着一方池塘,当竭力朝下望去时,看到了模糊的映像。我给它们编织了各种各样的故事。”^{[5]173}显然,这段叙述意在确立西方旅行者作为观者的主导地位,遮蔽了东方艺术品的制作和流传历史,暗示它们只有在西方的想象中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总之,维塔的东方游记作品体现了“想倾诉她自己的文化局限性的欲望,和作者对异域文化的控制欲之间的张力”^{[5]170}。

伍尔夫在维塔游历东方期间一直与她保持信件往来。有论者认为,这些通信正是《奥兰多》最初的灵感来源^{[4]183}。的确,从伍尔夫对维塔讲述异域所见所闻的回应中,我们不难发现伍尔夫本人对待旅行和异国文化的态度。在评价《德黑兰旅客》时,伍尔夫指出:

这本书里隐藏着好多边边角角,我喜欢研究它们。只是偶尔手里可能要拿支蜡烛——这是

我唯一感觉不好的地方——(我妄加猜测)在你的讲述中有几处语焉不详的地方。但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就是这种不拘一格、东拉西扯的方法,让人想起了你的皮肤……让人感觉你不在身边,四处旅行,但又不是到任何具体的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个遥远的地方。现在 I 懂了……去波斯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6]291}。

在伍尔夫看来,维塔独特的叙事风格既缓解了她的相思之苦,又满足了她的猎奇心理;维塔笔下的异域风情既被“情欲化”,象征维塔的身体,又被“神秘化”,是一个等待被发现、开发和解密的他者。又如,当维塔告诉伍尔夫她很难形容自己的所见时,伍尔夫难掩兴奋之情,即刻开始对异域的想象:“此刻,我感觉德黑兰比托维斯托克广场更真实。我仿佛看到你身着长长的外套和裤子,像一位阿比西尼亚皇后那样阔步巡视那片荒凉的山脉。”^{[6]238}而在另一个场合,伍尔夫又怀疑身处异国的维塔是否已经“遭遇不测,被土匪撕成碎片,然后吃掉”,或者被“淹死、射杀、强奸”^{[5]171}。萨义德指出:“将欧洲之东的地域空间命名为‘东方的’这一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做法部分地是政治性的,部分地是宗教性的,部分地是想象性的。”^{[3]268}显然,即便是在像书信这种个人和非正式表达中,伍尔夫的异域想象也挪用了西方旅行文学再现异域时的殖民主义修辞,是“为了确认一个强大和悲悯的非种族化白人自我而对种族他者进行的侵犯性建构”^{[7]7}。

二、吉卜赛人、归家叙事与土耳其的他者身份

上述分析说明,伍尔夫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思考是单向度的,或者说,是一种西方自我向东方的投射,实际上是对东方主义话语的复制,所以她无法从根本上认同异域文化,而只能承认“当我们思考西方和东方的问题时……我们放下笔,再也写不出什么了”^{[1]352}。伍尔夫把对东方的现实文化偏见带入对《奥兰多》东方场景的虚构。两相比较会发现,《奥兰多》对土耳其的文学再现,与伍尔夫的东方游记及与维塔的通信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

奥兰多的土耳其之旅是《奥兰多》最重要的情节之一。在经历了感情挫折后,奥兰多筋疲力尽、心灰意冷,感觉已无法在国内继续生活下去,于是请求国王把自己派往土耳其任大使,小说的旅行叙事由此展开。和现实中的伍尔夫一样,初到土耳其的奥兰多也被独特的异域景象所吸引,“从内心深处感到兴奋”,并对其产生“一种强烈的好感”,甚至怀疑“他的祖先与某个切尔克斯族农妇相好”^{[8]59},使自己具有了异族血统,才让眼前的一切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但对“骨子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8]59}的奥兰多来说,这种认同感只能是暂时并且是不真实的,所以才会让他感到惊讶,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土耳其人在奥兰多眼中是一群“肤色混杂的野蛮人”^{[8]58}。这部分说明,“《奥兰多》所认定的是一种在种族上不加区分的‘英国性’,它对现代西方以外的人种有不可撼动的权威”^{[5]169}。小说提到,土耳其人在苏丹的冲突中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对外国人施以酷刑,这一情节暴露了他们野蛮和残暴的本色,证实了奥兰多的第一印象。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奥兰多的高大形象和他的与众不同。和萨莎的丑闻让奥兰多在国内狼狈不堪,但到土耳其后他却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几乎对所有人都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他成为许多女人和一些男人的崇拜对象。他们并不一定要同他交谈,甚至不一定要看到他,反正总是能想象出一

位穿丝质长袜的高贵绅士的形象,而当看到浪漫场景或夕阳西下时更是如此。他对有钱人和对穷人和文盲一样有影响力。”^{[8]61}这种处理方式和伍尔夫在东方旅行笔记中对伦敦人的描写异曲同工,都是对“英国性”海外散播过程的象征性描述,旨在凸显英国的海外影响力。其实,从一开始,奥兰多就以英国为标准 and 参照评价异域所见:“没啥地方……比这里更加不像萨里和肯特的县城,或者伦敦和滕布里奇韦尔斯的小镇。光秃秃、满是石砾的亚洲群山在左右两侧耸立,看上去不太友好,或许上面有强盗头的破烂城堡;但却没有牧师的房子,也没有庄园主的宅子,亦不见村舍、橡树、榆树、紫罗兰、常春藤和野蔷薇的踪影。”^{[8]58-59}但实际上,早在奥兰多开始异域旅行之前,小说就已经突出了他与英国自然景物之间的精神维系,以此彰显其民族身份:奥兰多在英国的国树橡树中为自己“漂泊的心”找到坚实的依托,并且创作了一首题为“橡树”的诗,寄托对英国大地的深情。奥兰多的民族认同感在异域环境中的迸发顺理成章,并且在异域景观的衬托下被强化和放大了。因此小说所呈现的土耳其“是一个在奥兰多内在的‘英国性’的映衬下让人生厌、晦暗和难以理解的国家”^{[5]184}。

这种认同感在奥兰多与土耳其吉卜赛人的交往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小说借此进一步演绎了西方与东方之间进步与落后、文明与原始的二元对立,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借助他者构建“英国性”的身份认同逻辑。奥兰多在土耳其实现了性别转换,而吉卜赛人部落是他变身女性后驻足的第一站,因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伍尔夫想象一个包含性别、种族和正在显现的女同性恋欲望的复杂关系网”的场域^[9]。在英国,“从1910年到1930年,在人类学研究、通俗小说、诗歌、游记、民间传说和语言学研究等领域涌现了大量关于吉卜赛人的著述,在讨论异域风情、原始主义、自然、性别和野性时重点关注吉卜赛人”^{[10]142}。这是《奥兰多》塑造吉卜赛人的宏观背景。相对于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西化的君士坦丁堡,小说中的吉卜赛场景蕴藏着更多的叛逆精神,表现出更加独立的文化品格。“生活在荒野中,吉卜赛人组成了另外一种形态的社会,那里不受社会等级、权威和法律的侵扰,阶级和性别等主要决定因素暂时不起作用,从整体上看,这种生活方式在小说中代表了一种乌托邦视角。”^{[11]157}这正应和了奥兰多性别身份的转换所具有的颠覆能量:对已成为女性的奥兰多而言,吉卜赛人部落是一个世外桃源,在那片远离世俗尘嚣的乐土上,她可以不再理会种种陈规陋习、繁文缛节,尽情释放和挥洒自己的性情。

但随着了解的深入,奥兰多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种族身份开始抑制她因性别身份而对吉卜赛人产生的认同,小说对吉卜赛人形象的塑造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西方对吉卜赛人的脸谱化。“在19和20世纪对吉卜赛人的描写中,他们是不可靠的,很难归类,经常炫耀和欺骗——穿着华丽的衣服,表演夸张的歌曲和舞蹈,耍花招,玩弄手上的把戏。”^{[10]143}在西方人眼中,吉卜赛人是能够满足他们对异域的猎奇心态的对象。20世纪20年代,曾有西方论者指出,吉卜赛人“是我们与东方、与神秘之物和神奇之物唯一的联系”,他们“为我们揭开了东方的神秘面纱”^{[10]146}。西方人之所以不能认同吉卜赛人,将其视为文明的边缘甚至是异类,一个重要原因是吉卜赛人居无定所,四海为家,没有一个固定的根基,所以在很多方面都被认为只是流于表面,缺乏深度和内涵,也就不具备与西方对话的资本。而这也正是小说中奥兰多对吉卜赛人的看法。奥兰多与吉卜赛人在人生观和世界观方面存在巨大分歧。比如在看待自然的问题上,吉卜赛人认为自然就是季节更替和生老病死等自然现象,除此无它。一位吉卜赛智者伸出他饱经风霜的手给奥兰多

看,告诉她这就是自然。但在奥兰多看来,自然只是一个表象、一个象征,“一切事物实际上都是其他事物”^{[8]70}。奥兰多可以从自然想到现实,再由现实过渡到真理,进而触及“爱情”“友谊”和“诗歌”等概念,最后产生文学创作的冲动,她自创并视为珍宝的诗歌“橡树”其实就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在解释这种差异时,奥兰多认为原因在于“她来自一个古老和文明的种族,而这些吉卜赛人愚昧无知,比野人好不了多少”^{[8]72}。虽然这种想法为吉卜赛人所不齿,但奥兰多依然坚信她的种族优越性,认定自己无法在一个“既没墨也没纸”的地方待下去,于是产生了强烈的思乡情绪:

对面光秃秃的山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阴影,尽管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下阴影。这个阴影的颜色迅速加深,没过多久,在之前是岩石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绿色的空洞。她看着看着,这个洞越来越深,越来越宽,随后在山的侧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公园似的空间。她看见绿油油的草地随风起伏,橡树点缀四处,画眉在树枝间穿行。她看见鹿在树荫间信步,甚至能听见昆虫在哼唱,感受到英国夏日那柔和的悸动。她看得入了神,过了一会雪花开始飘落,不一会儿,黄色的阳光渐渐退去,整个场景染上了紫罗兰色^{[8]73-74}。

从自然到文学再到自然,浸淫西方美学和人文传统的“英国性”在奥兰多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反复出现的作为民族身份构成要素的景观隐喻……强调眼睛归化与民族从属关系的修辞及其集体表达形式的力量。”^{[12]295}奥兰多对英国自然景观的不断唤起即是借助这种修辞对民族身份的刻写,“将英国民族身份概念表述为一种输出的具有控制力的意识形态,除了英国人,其他人都不能拥有或体现”^{[13]107}。结合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观点来解读上述引文对英国气候的渲染,这种身份认同策略就更容易理解。巴巴指出,“英国气候……唤醒了对其恶魔般对立面的记忆:印度的酷热和尘埃;非洲黑暗的空虚;被认为是专横和难以管理,因此需要文明教化的热带的混乱”^{[12]319}。奥兰多对英国风景,特别是季节的浪漫主义想象,其潜台词是对异域文化的偏见,同时也直接表现了海外英国人在经历幻灭后产生的回归本土的欲望。

《奥兰多》中的另外一个关键情节便是奥兰多的回归,这与他的出走相呼应,直观表现了由“出航”和“返航”、“离心”和“向心”两种截然相对的旅行路径所折射出的内在于“英国性”、同时也是建构“英国性”所必需的文化张力。“如果说走出英国去享受一种彻底的自由起初是可以想象的话,那么事实最终证明,东方似乎有点太过于散漫了,奥兰多摆脱了外交职位强加给他的父权枷锁后与吉卜赛人打成一片,他们即是这种无根性的象征。”^{[4]202}异域之旅并没能激发奥兰多的文学创作灵感,回国后,在英国浓郁文化气息的熏陶下,奥兰多才思泉涌,最终完成了萦绕心头数百载的诗篇。卡伦·劳伦斯(Karen Lawrence)认为,在《奥兰多》中,“体现在奥兰多的归家和它所象征的对英国文学传统的‘守护’这种向心运动,和土耳其之旅这种离心运动以及与对多重性别可能性的奇想一样重要”^{[4]201}。小说通过将奥兰多在土耳其的经历嵌入英国的文化和历史绵延中,刻意从形式上凸显并由此强化和固化了异域的他者身份,说明“‘英国性’对非英国的定义是其定义自身所必需的”^{[14]148}。作为伍尔夫“在他者性和权力与特权之间的叙事协商”^{[13]45},《奥兰多》“将东方置于由西方的进步叙事所决定的年表中,并最终将其简约为一个缺乏实质、含

混不清和非历史的地理位置”^{[5]177}。

三、结语

伍尔夫将自己的东方见闻与她所理解和想象的维塔笔下的东方风情相结合,构建了《奥兰多》观看东方的殖民主义视角。在厄米拉·塞莎格里(Urmila Seshagiri)看来:“‘西方和东方的问题’贯穿弗吉尼亚·伍尔夫许多重要作品,将‘英国性’和现代性转化为被种族差异、帝国主义和东方主义定义的场域。”^{[5]140}进一步看,《奥兰多》中的土耳其他者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土耳其两国的政治关系。一战后,土耳其爆发了反抗苏丹奥图曼帝国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并于1923年成立主权共和国。为了维护帝国在东方的利益,英国对土耳其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了政治和军事干预,几乎演化成战争。伍尔夫本人虽没有直接经历英土两国的冲突,但通过阅读对此有大致地了解。维塔的丈夫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曾作为英方代表参与解决一战后的土耳其政治危机,并于日后出版回忆录《一些人》(*Some People*),用文字再现了这段经历。伍尔夫于1927年9月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为其撰写书评。尼克尔森融传记和自传、事实和虚构于一体的写作手法备受伍尔夫赞许,为她创作《奥兰多》提供了诸多启发^{[11]158-160}。正如林登·皮奇(Linden Peach)所论:“当一位20世纪20年代的读者读到奥兰多在君士坦丁堡的经历时,很难想象他不会由此想到英国和土耳其近在咫尺的战争。”^{[14]145}而在21世纪的今天,对《奥兰多》进行语境还原,能帮助我们认清小说他者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地缘政治内涵,揭示出伍尔夫作为一名宗主国作家,在大英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背景下,向渗透着殖民意识的英国民族身份的主动靠拢,彰显出追求艺术革新的现代主义文学所具有的政治性和现实性。

参考文献:

- [1] WOOLF V. A passionate apprentice: the early journals 1897—1909[M]. New York &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0.
- [2] MAXWELL A. Encountering the cultural other: Virginia Woolf in Constantinople and Katherine Mansfield in the Ureweras [J].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2007(2/3): 19—40.
- [3] 爱德华·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 [4] LAWRENCE K R. *Penelope voyages: women and travel in the British literary tradition* [M].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5] SESHAGIRI U. *Race and the modernist imagination* [M].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6] WOOLF V.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1923—1928* [M]. New York &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 [7] HACKETT R. *Sapphic primitivism: prod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sexuality in key works of modern fiction* [M].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 [8] WOOLF V. *Orlando* [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2003.
- [9] KAIVOLA K. Revisiting Woolf's representations of androgyny: gender, race, sexuality, and nation [J]. *Tulsa Studies in Women's Literature*, 1999(2): 235—261.

- [10] BLAIR K. Gypsies and lesbian desire: Vita Sackville-West, Violet Trefusis, and Virginia Woolf[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2004(2): 141 – 166.
- [11] BRIGGS J. Reading Virginia Woolf[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2] BHABHA H K.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C] // BHABHA H K.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291 – 322.
- [13] OLSON L T. “This, this is England. but we only passed by”: reclamations and subversions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in works by Woolf, Waugh, Rhys and Naipaul[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98.
- [14] PEACH L. Virginia Woolf[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责任编辑:楼启炜)

The orient and orientalism in *Orlando*

QI L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Abstract: The domestic academia pays scarce attention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Orient in *Orlando*. Virginia Woolf exhibits an obvious Orientalist mentality in the journals and correspondence with her lover Vita Sackville-West regarding her visit to the East. And she weaves this mentality into the novel *Orlando*, which, by delineating Orlando’s prejudice and superiority over Turkish landscapes and the Gypsies in Turkey, and by portraying Orlando’s desire for motherland, highlights Orlando’s raci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as a white Anglo-Saxon, and degrades Turkey into a cultural Other. *Orlando*’s colonial vision, to some degree, alludes to the politic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England and Turkey in the 1920s, disclosing the novel’s geopolitical dimension and revealing Woolf’s involvement in England’s imperial politics.

Key words: Virginia Woolf; *Orlando*; Turkey; orientalism; Englishness